

“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现象研究 ——与郭建斌教授商榷

刘建明

摘要

本文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确存在“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的现象,尤其是“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事件”、“媒介仪式”等。“传播的仪式观”的内涵是,“仪式”不仅是传播的类比,而且是传播的实质,传播等同于仪式。

“媒介事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受到认同的同时,也遇到不断的质疑、补充和修订。“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

关键词

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事件,媒介仪式

作者简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传播理论、广播电视学、舆论学研究。电子邮箱:liujm66@hotmail.com

On misunderstanding of several key conception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Consulting with Professor Guo Jianbin

Liu Jianming

Abstract

The thesis argues that, there is indeed misunderstanding of several key conceptions such as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media events’ and ‘media ritual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means that ritual is not only an analogy to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essence of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equals ritual. ‘media events’ is a dynamic conception which has been continually doubted, complemented and revised, meanwhile it is identified. ‘media rituals’ is distinguished from and connected with ‘media events’.

Keywords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media events, media rituals

Authors

Liu Jianmi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Email:liujm66@hotmail.com

郭建斌教授在《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发表《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一文,指出我国传播学界存在“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的情况,尤其是“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事件”、“媒介仪式”等,并试图厘清这些概念。本文认为,的确存在这些概念被误读的现象。但是,它们是如何被误读的,它们的真正涵义是什么,本文并不完全同意郭教授的看法。下文将逐步展开对这些概念的认识。

一、“仪式”不仅是传播的类比,也是传播的实质

郭教授指出,理解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要注意四个问题。本文认同其中两个问题:“传递观”与“仪式观”具有“范式”差别意义;“传递观”与“仪式观”不可分。但是对另外两个关联性强的问题,即“传播的仪式观”是人类传播现象的一个隐喻层面的问题,以及“仪式”在凯瑞的表述中主要是一个类比,本文持不同看法。本文认为,“仪式”不仅是传播的类比,也是传播的实质。

视“仪式”为传播的类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有郭建斌教授,还有他提到的人类学家格兰姆斯。格氏在讲到凯瑞关于传播与仪式的关系时也曾说,“凯瑞仅仅是在类比层面上来使用仪式。”(Grimes,2006)这种“类比说”可能源于凯瑞将宗教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metaphor)。的确,凯瑞承认“传播的仪式观有着明确的宗教起源,而且它也从未完全脱离这一基本的宗教隐喻。持这一观点的作者常常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追寻这一传统”(詹姆斯·凯瑞,2005:7)。如此看来,凯瑞从涂尔干对宗教生活的见解中受到启发。通过对澳洲土著居民宗教生活的田野考察,涂尔干把宗教分为信仰和仪式,信仰是宗教的观念形态,仪式是宗教的行为形态。初民平时生活都是分散进行的,为的是谋取生活必需品;在节假日举行的集体宗教仪式,则能增进群体情感,统一群体价值,从而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凯瑞认为传播具有宗教仪式一样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宗教仪式的日渐式微,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人类传播活动日益取代宗教仪式,成为社会序化和整合的必要工具。因此,从社会整合的角度认识大众媒介和传播的意

义,也被称为“新涂尔干主义”(Neo-Durkheimism)。

既然凯瑞把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根据修辞学的模式,意味着“传播是仪式”;它不同于明喻,如果是明喻,就意味着“传播像仪式”。隐喻毕竟也是一种比喻,意味着传播与仪式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更何况“仪式”属于神学、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范畴,与通常意义的传播概念相去甚远。因此,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成为“仪式是传播的类比”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

但是,仪式与传播之间的关联度仅仅停留在类比层面吗?本文给予否定的回答,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其实断定“传播就是一种仪式”,二者是等同关系,而不是类比关系,易言之,仪式是传播的实质内涵。这体现在凯瑞对“传播的传递观”的态度、对“传播的仪式观”的界定、“传播的仪式观”的思想渊源以及传播与仪式的关联4个方面。

1、凯瑞反对“传播的传递观”的主导地位。他区分“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旨在纠正传播学界(以及现代社会的大众)过度关注“传播的传递观”而忽视了“传播的仪式观”,他主张把二者的轻重顺序颠倒过来。凯瑞承认,“这两种对立的传播观不需要彼此否定。”(詹姆斯·凯瑞,2005:10)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如郭建斌教授所言是“硬币的两面”。凯瑞不是否定“传递观”的存在,而是否定“传递观”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占据主导位置。这是因为他认为“传递观”把传播视作“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詹姆斯·凯瑞,2005:5)它“与19世纪人们渴望利用传播和运输,以扩大对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大人口的影响、控制与权力有关。”(詹姆斯·凯瑞,2005:28)凯瑞反对“传递观”的功利性,以及这种单向性的、空间偏向的话语霸权。另外,由于人们对传递观的迷恋,造成社会模式的紊乱。在传递观的宰制下,社会被视为“一张由权力、管理、决策与控制的网”,即政治秩序;或者被视为“所有权、生产与交易的关系”,即经济秩序。传递观忽视了在凯瑞看来更加重要的“仪式的秩序”,即“对美学体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与情感以及学术观念的分享”(詹姆斯·凯瑞,2005:21)。

2、凯瑞明确指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

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詹姆斯·凯瑞,2005:7)传递观强调信息在空间的扩散,而仪式观则强调媒介在时间上维系社会的作用,强调一切文化传承活动都是传播行为。由于仪式事关重复和循环,事关维系和保存,事关记忆和传统(Strate,2007),因此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仪式,一种文化仪式或文化行为,用来维系在缺乏传播的情况下容易陷入混乱的、脆弱的人类文化。

凯瑞认为传播的“传递观”的主导地位是伴随近代通信和交通技术快速发展而至的,而“仪式观”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观点。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在古文中“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和“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这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即传播)在古代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詹姆斯·凯瑞,2005:7)这些词汇及其反映的活动具有形式化和仪式性的特征,因此,“仪式观”复苏了传播的传统意涵。

3、传播的仪式观受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英尼斯(Harold Innis)等思想影响。凯瑞在晚年与得意弟子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对话中称,当年(1975)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为了表达了对威廉斯的敬意和支持(Packer & Robertson,2006:200)。威廉斯认为文化包含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文化的传承和分享活动。凯瑞对英尼斯赞赏有加,专门撰文《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副标题是“献给英尼斯”。英尼斯区分空间偏向(space-bias)和时间(time-bias)偏向的媒介/社会,“传递观”和“仪式观”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略有不同的是,凯瑞使用空间联结(space-binding)和时间联结(time-binding)分别与之对应。英尼斯主张时间偏向的媒介/社会以抑制空间偏向的媒介/社会过度膨胀,主张弘扬口语文化以维持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的媒介/社会的平衡发展;凯瑞倡导传播的仪式观以纠正传递观的主导地位,提倡对话(conversation)文化以恢复传播的主体间性。文化的传承活动有赖于各种仪式——宗教的、世俗的仪式,过渡仪式或日常生活中琐碎礼仪。这些仪式都是形式化的,具有传播功能,人类传播正是维系社会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各种仪式。

4、凯瑞认为传播和仪式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他从芝加哥社会学派关于符号互动论中汲取了思想营养(詹姆斯·凯瑞,2005:12)。米德、库利、戈夫曼等芝加哥学派代表思想家认为,人类交往就是符号互动过程,它们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凯瑞认为传播就是人类交往(大众传播是大规模的符号互动和人类交往),这些互

动和交往具有形式化和仪式性的性征。即便是大众传播,也具有很强的仪式性,他把读报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詹姆斯·凯瑞,2005:9)。因此传播就是仪式,传播等同于仪式。

凯瑞论述“传播的仪式观”的论著并不多,集中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1975)和《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1977)两篇论文,随后他搁下这方面的研究,回到传播技术与文化、新闻与美国民主、新闻教育等研究领域,以至于有人怀疑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否心血来潮,是否后悔这种提法。在晚年面对格罗斯伯格提出这个问题时,凯瑞回答:“我仍对这种提法(‘传播的仪式观’)感到高兴”。对于为什么没做进一步研究,凯瑞的回答是,“既然(‘传播的仪式观’)已经得到广泛的反应和认同,(自己)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研究下去。”(Packer & Robertson,2006:200)实际上,传播的仪式观是凯瑞深思熟虑的结果。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他就一直呼吁传播学者重新反思传播即信息传递这一根本假设,建议将社会生活(即符号互动或传播)的循环往复,定位为各种过渡仪式以及人们相互之间交流共享文化符号的仪式(Packer & Robertson,2006:114)。这种大胆的设想颠覆了传统的传播观,预示着将给传播学带来观念上的革命,这场革命终于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得以实现。

二、“媒介事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媒介事件”(media events)一词的首次提出是卡茨(Katz,E.)发表在《视觉人类学研究》1980年第6期一篇论文《媒介事件:在场的感觉》,开始引起西方传播学界的注意。几年后他与戴扬(Dayan,D.)合作撰写《竞赛、征服、加冕:论媒介事件及其英雄》一文,收录在1986年出版的《变化中的领导力观念》一书中,“媒介事件”一词在西方传播学界流行开来。在此基础上,两人进一步拓展内容,于1992年出版了《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国传媒大学(时称北京广播学院)的麻争旗老师将其翻译成中文于2000年出版,在我国传播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和引用。同时,也存在一些误读,主要表现为:

1、媒介事件被误读为媒介报道的(重大)事件。我国研究者使用“媒介事件”主要援引《媒介事件》一书的界定,但是往往忽视了该书的副标题——“历史的现场直播”。虽然作者表明了“媒介事件”是“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但是,无论该书还是后来学界的诟病和指正,以及卡茨本人对“媒介事件”定义的修订,所援引的案例都来自于电视直播的重大事

件。“媒介事件”主要指电视直播的“特殊的电视事件”(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1-2)。“事实上,我们可以称这些事件为‘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电视样式”和“带光环的电视”。戴扬和卡茨笔下的“媒介事件”属于也有别于(重大)新闻事件,前者是“提前策划的”,播报语调“崇尚秩序及其恢复”;后者是自然发生的,“讲求偶然性、突发性”,播报语调相对客观、冷静(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5)。为什么电视“提前策划”、“现场直播”在戴扬和卡茨看来如此重要?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给观众带来即时的在场感,或者“天涯共此时”的参与感。尽管这种在场感、参与感是虚幻的,但是在这种虚幻中,观众产生了国家认同感、自豪感,或者同心同德的团结感,整个国家达成涂尔干所说的“机械的团结”。正如美国公共电台的丹尼尔·肖尔对《媒介事件》一书的评价,“它全面、深刻、创造性地把直播这一现象描述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该书在认识电视所具有的影响力方面是一个里程碑。”(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封底)

2、媒介事件被误读为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的“伪事件”(Pseudo-Events)(1961)。这种误读认识到二者所具有的“提前策划性”,但是忽略了从符号关系学上讲媒介事件所具有的“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等特征。(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11)布尔斯廷创造了“伪事件”这一含有轻蔑意味的词汇,是想表明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伴随公共关系业的崛起,大众媒介越来越充斥着提前策划而不是自然发生的以供媒体报道的所谓新闻事件,以实现利益集团、组织或个人的宣传目的。“伪事件”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人为事件,被渲染夸大有重要意义而加以报道,属于“策划新闻”。“媒介事件”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虽然也是提前策划的报道,属于“新闻策划”,但是事件的重大性又衍生出“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即媒介事件中断了人们日常按部就班的生活习惯,排斥其他新闻报道,由电视现场直播,多数情况下发生在国内遥远的地方。

“媒介事件”被列入“仪式”视角下的传播研究,理由为:

1、媒介事件的三种电视脚本中,“‘征服’和‘竞赛’都包含很强的仪式成分,但‘加冕’完全是仪式。”(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31)

2、从电视台对媒介事件的采制、播出,直到观众的收视行为,全程充满了仪式般的崇敬和神圣感。“主持这类节目的记者们暂时搁置往常的批评立场,而拿出了尊敬甚至敬畏的态度”。“这种播出把我们带到了社会的神圣核心的某个方

面”。观众“彼此相告必须收看，必须把别的搁在一边”，“聚集在电视机前进行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庆典。”(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8-9)简言之，戴扬和卡茨强调了媒介事件报道和收视过程的仪式化。

3、《媒介事件》“试图引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涂尔干,1915;汉德尔曼,1990;莱维-斯特劳斯,1963;特纳,1985)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2)¹具体包括:涂尔干对宗教仪式作为一种象征形式而促成社会“机械的团结”的研究;汉德尔曼对公共事件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关于引起变革的仪式事件的研究;莱维-斯特劳斯关于符号功效或仪式功效的研究;特纳关于仪式的“反结构”,尤其是仪式“阈限”的研究等。

《媒介事件》的出版比“传播的仪式观”的提出晚17年,虽然是从仪式的视角研究大众传播问题,但是通读全书,没有一处引用或参考凯瑞的观点,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媒介事件”概念在受到广泛赞誉的同时,也饱受诟病,但与郭建斌教授指出的“不足”有别,主要指责聚焦在媒介事件的脚本划分上。戴扬和卡茨区划“竞赛”、“征服”、“加冕”三种媒介事件电视脚本,分别依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威性的三种维度: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30)。批评者指责媒介事件的界定过于主观和严苛、分类过于狭隘、后果局限于积极方面(仅限于“正能量”)。批评者还尝试提出媒介事件新的界定标准和案例,以补充其不足。

威曼(Weimann, G.)率先突破藩篱,将恐怖事件列为媒介事件。他认为恐怖事件是恐怖分子提前策划的媒介事件,他们企图通过吸引媒体报道,以引起世人关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媒体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帮凶(Weimann,1987)。但是它们又不同于戴扬、卡茨笔下的媒介事件,后者是由媒体提前策划,并与事件的组织者协商的结果,前者是由恐怖事件发动者单独提前策划,媒体只是即时报道,双方不存在实际的协商。凯瑞提出另一种媒介事件——驱逐仪式(rituals of excommunication),也介入了这场争论。他以伯克听证会²为例,否认媒介事件仅限于积极后果。驱逐仪式失去了凯瑞以往盛大仪式隐喻所具有的万众一心的庆典涵义,也不同于以往媒介事件的喜庆和欢乐气氛。驱逐仪式向公众展示了“社会暴政”,对民主政治极其有害。在凯瑞看来,驱逐仪式强化社会差异观念,容易引起社会分裂而不是整合(Carey,1998)。利比斯(Liebes, T.)以以色列发生的系列自杀式汽车爆炸案为例,把对这类灾难事件的连续报道纳入媒介事件范畴。电视报道这类

事件,往往受收视率和经济利益驱使,结果失去了媒介事件“提前策划”和“积极后果”(国族团结)的特征,但仍具备其他主要特征(Liebes,1998)。媒介报道的战争和政治联盟也分别由瓦克和克罗兹列为媒介事件(Couldry, Hepp & Krotz,2010:8),媒介事件的范围和类别进一步扩大。

在这场争议持续整整20年之后,卡茨终于“重出江湖”,与利比斯联名对媒介事件的界定进行修订,将恐怖袭击、灾难和战争的媒体报道纳入新型媒介事件——“破坏性”媒介事件(‘disruptive’ media events)。他们认为观众玩世不恭的态度、失落感和碎片化正在弱化对仪式性事件的关注;许多事件突如其来,难以做到预告,也有损于媒介事件往常的影响力。更吸引观众的新闻事件,恰恰是这些“破坏性”媒介事件(Katz & Liebes,2007)。“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报道失去了仪式规则及其神圣性,也就是说,媒介事件外延拓展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固有的仪式性内涵。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破坏性’事件仍然含有仪式的神圣成分,比如新闻叙事的神圣性,对官员处理灾难现场的崇敬态度,以及在国家危难关头记者通常对核心价值的重申等。”(刘建明,2012; Sella,2007)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媒介事件的界定还会受到进一步质疑。就在《媒介事件》出版(1992)后的数年间,陆续发生了戴安娜王妃遇难和“911”恐怖袭击案,其报道和影响远超国家范围,这类事件的全球性报道日趋增多,从而变成了国际性事件。这样,媒介事件的边界——“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2000:1)——便受到挑战。互联网的普及加剧了这种挑战,而且,互联网带来的观点多元化,也会一定程度上消解媒介事件后果的积极性和一致性。

三、“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差异和关联

郭建斌教授把“媒介仪式”界定为“那些经由大众传播媒介记录并传达的仪式以及那些经由大众传媒‘包装’之后具有仪式意味的‘新闻事件’”(郭建斌,2014)。这是中文语境下对“媒介仪式”的理解,在我国传播研究者中具有代表性。虽然郭教授称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有区别也有联系,这也是本文所认同的,但是上述界定实际上仍然混淆了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在英文语境中,存在两种“媒介仪式”表述。一种是戴扬、卡茨笔下的media ceremony(Dayan and Katz:160,221),根据该词出现的语境,它实际上指的仍然是媒介报道的盛大仪式,即媒介事件,这也是我国研究者普遍的认识。另一种是英国传播学者寇德瑞(Nick Couldry)的media rituals。寇德瑞在2003年出版专著《媒介仪式:一种批评方法》(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在西方传播学界和我国一些传播研究者中得到回应和认同。

在寇德瑞的“媒介仪式”概念里，“‘媒介’并非指任何媒介或媒介化过程，而尤指那些主要媒介，尤其是电视，还有广播、报纸，有时也指电影和音乐，以及日益崛起的互联网。通过这些媒介，我们想象自己与社会世界相连结。”(Couldry,2003:2)这里的“仪式”，寇德瑞采用了人类学的部分观点。在人类学视野中，“仪式”有3种涵义：“1、习惯性的行动；2、形式化的（formalised）行动；3、含有超常（transcendent）价值的行动。”(Couldry,2003:3)在“媒介仪式”中，寇德瑞采纳了“仪式”的第2、3种涵义，将“媒介仪式”正式定义为：“围绕与媒介相关的基本类型（categories）和边界（boundaries）而组织（organise）的形式化的行动，其行为表现（performance）设定（frames）或联想到(suggests a connection with)与媒介相关的更广泛的价值。”(Couldry,2003:29)这里，“与媒介相关的基本类型”指“真人秀、直播和媒介人物等”。(Couldry,2003:14)“边界”指媒介内与媒介外的界限。在寇德瑞看来，这些类型和边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媒介仪式引导我们关注“与媒介相关的更广泛的价值”，这种价值植根于“媒介化中心的神话”，即媒介对社会中心的建构，以及媒介作为我们进入这个中心的直接设定的入口。“直言之，‘媒介仪式’是围绕与媒介相关的基本类型和边界而组织的任何行动，其行为表现强化（实际上有助于合法化）潜在的‘价值’，即媒介是我们通向社会中心的入口。通过媒介仪式，我们践行（实际上自然化）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神话。‘媒介仪式’术语包含许多情况：从电视收视的某种仪式化行为，到人们谈论媒介内容，再到我们一听说刚进入房间的是一位媒介名流便会立刻刮目相看。”(Couldry,2003:2)

“媒介仪式”试图阐释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或者，媒介在序化我们生活、组织社会空间的作用。为什么我们更关注媒介，甚至离不开媒介，而对其他事物更为漠然？为什么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似乎代表了我们生活的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人们会以为媒介具有代表或再现整个社会的能力？这些都是媒介仪式试图回答的问题。假若社会世界存在一个中心，那么媒介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这个中心，这就是寇德瑞所说的“媒介化中心的神话”。我们接受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合理性，而媒介仪式正是这种合理性得以再生产的关键机制。

“媒介仪式”概念旨在凸显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社会建构作用，彰显或自然化这样的等级序列：媒介上呈现的事物/人物/地点等，高于（over）媒介之外的事物/人物/地点等，或者说前者比后者更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仪式是媒介

为媒介上呈现的事物/人物/地点等举行的“加冕”仪式(刘建明,2013)。寇德瑞采用“媒介仪式”概念来解释媒介事件的现场直播、媒介朝圣(观众造访拍摄地)、真人秀节目,以及人们在媒体上表露心声等现象。

由此可见,“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规模)看,二者也有密切的相关性。从内涵看,媒介事件属于媒介仪式的典型事例,因为它充分而实在地体现了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社会建构作用,体现了“媒介化中心的神话”。媒介事件不仅为人们建构一种社会中心的感觉,也把媒介自身建构为通向这个社会中心的直接入口。从外延(规模)看,媒介事件是由媒介仪式构成。虽然媒介事件是个动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界定和争议中,其基本特征得到一致认同。这样,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的基本关联依然清晰可辨。媒介事件是大规模的公共事件,它聚焦于一个中心事件的电视直播,在整体行动框架下连接了不同地点(譬如家庭)的收视行动,而这些单个的收视行动,可以冠之以“媒介仪式”。也就是说,媒介仪式发生于媒介事件之中,媒介事件是由无数小规模媒介仪式所组成的,这些仪式指形式化的、崇敬的、小范围的收视行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电视和一般现代媒介改变了当今仪式的条件,媒介接触行为自身可能成为一种仪式。其次,在媒介事件语境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收视行动(戴扬和卡茨称之为“节日收视”),即媒介仪式。通过大规模的媒介聚焦的社会过程(即媒介事件),媒介作为社会纽带和社会中心的价值(至少是假设的价值)得以确认,这也正是媒介仪式所蕴含的“与媒介相关的更广泛的价值”(Couldry,2003:60)。因此,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既相互区别,又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朱立芳)

注释 [Notes]

1. “仪式人类学”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读,包括郭建斌教授在内,都把它当作人类学的支派来理解。实际上,人类学不存在这样一个支派。问题与翻译有一定关系,原著中,作者使用的是“anthropology of ceremony”、“ceremonial anthropology”,本文认为,译为“人类学关于盛大仪式的理论”更符合原意。作者使用了“ceremony”,而不是“ritual”,意指盛大的、隆重的仪式,以区分于日常生活中相对琐碎的礼仪礼节(rite),而ritual意义更宽泛,既包含ceremony,也包含rite。
2. 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提名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法官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从而可能改变最高法院的多数。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进行表决,结果否决了总统的提名。公共事务频道、美国公共电视网、CNN等对听证会进行现场直播,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美国多数民众在收看电视后不认可伯克,伯克最终未能进入联邦最高法院。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Carey, J. W. (1998). Political ritual on televis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shame, degradation and excommunication. In T. Liebes & J. Curran,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3).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 Couldry, N., Hepp, A. & Krotz, F. (2010).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Grimes, R. L. (2006). *Rite out of place: Ritual, media, and the a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tz, E. & Liebes, T. (2007). 'no more peace!': How disaster, terror and war have upstaged media ev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 Liebes, T. (1998). Television's Disaster Marathons: A Danger for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T. Liebes & J. Curran,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Packer, J. & Robertson, C. (eds.) (2006). *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Essays 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Introduc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Sella, Z. K. (2007). The journey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7 (1).
- Strate, L. (2007). Understanding a man in time: James w. Carey and the media ecology intellectual tradi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4 (2).
- Weimann, G. (1987). Media events: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1 (1).
- 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 (2000). 《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 北京: Beijing (原著出版于1992).
- [D. Dayan & E. Katz (2000).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Trans.)*. Beijing: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 郭建斌 (2014). 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 《国际新闻界》, (4).
- [Guo Jianbin (2014). "Media Events" and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4).]
- 刘建明 (2012). “仪式”视角下的传播研究——一种强效果论及其反思.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2.
- [Liu Jianming (2012).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A Power-effect Theory and Reconsiderati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2.]
- 刘建明 (2013). “传播的仪式观”和“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与樊水科商榷. 《国际新闻界》, (4).
- [Liu Jianming (2013). Re-distinction between "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Consulting With Fan Shuik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4).]
- 詹姆斯·凯瑞 (2005).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1989).
- [Carey, J. (2005).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Trans.)*. Beijing: HuaXi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